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职业分层与代际差异视角的考察

王超恩¹, 符平²

(1. 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基于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文章在揭示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及特征的基础上, 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 Logit 模型分析了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 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 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 且其向上流动的动机也最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整体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尤以 20~23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为活跃,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呈现出倒 U 型流动轨迹的特征。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高、职业流动性越弱, 而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 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农民工; 职业流动; 代际差异; 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3) 05-0089-09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WANG Chao-en¹, FU P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this paper uses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and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to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their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Those with jobs belonging to middle level have the strongest willing for upward mobility.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收稿日期: 2013-03-21; 修订日期: 2013-07-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 王超恩(1990-), 湖南邵阳人,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学。

gener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those aged between 20 to 23 flow more frequently. Their occupational mobility results show an inverted U-type tendency. Migrant workers with more human capital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table employment.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base on these result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1. 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

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1]。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2]。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3]。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4],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5]。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6]。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7]。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8],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9]。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0]。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Logit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调查方法是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4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025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

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 1980 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 1980 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 1122 份，新生代农民工 1903 份，分别占总体的 37.09% 和 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1.17 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2.89 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4.57 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 1 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 2 所示。

表 1 农民工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及其赋值		
职业分层	职业类别	变量赋值
低端职业	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干苦力、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低端）、服务行业人员（低端）	1
中端职业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销售人员、服务行业人员（中端）	2
高端职业	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	3

表 2 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单位
个人特征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
	年龄	（岁）
	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为 1，第一代农民工为 0
人力资本积累	文化程度	文盲为 1，小学毕业为 2，初中为 3，上过高中但没毕业为 4，高中毕业为 5，中专毕业为 6，大专及以上为 7
	技术职称	没什么技术为 1，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为 2，有初级技术证书为 3，有中级技术证书为 4，有高级技术证书为 5
家庭责任	婚姻状况	已婚为 1，未婚、离婚、丧偶为 0
	家庭劳动力数量	（个）
	子女数量	（个）
工作状况	工作时间	（小时）
	劳动合同签订方式	没有签订为 1，半年以下为 2，半年到 1 年为 3，1~2 年为 4，2~5 年为 5，5 年以上为 6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	（次）

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 年）约有 51.67% 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 2.52 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 3 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 0.90 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 1.51 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 30%）要高，但劳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 17%，第一代只有 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表 3 自变量基本情况描述

变量名称		总样本		发生过职业流动		未发生过职业流动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个人特征	性别	0.60	0.48	0.6	0.49	0.60	0.48
	年龄	31.17	10.11	29.08	9.41	33.39	10.36
人力资本积累	文化程度	4.09	1.66	4.21	1.67	3.97	1.63
	技术职称	1.93	1.06	1.87	1.03	1.98	1.08
家庭责任	婚姻程度	0.57	0.49	0.49	0.50	0.67	0.47
	家庭劳动力数量	2.94	1.27	3.05	1.26	2.83	1.27
	子女的数量	0.82	0.93	0.66	0.87	1.00	0.96
工作状况	工作时间	9.47	2.83	9.42	2.63	9.52	3.02
	职业层次	1.44	0.67	1.47	0.67	1.41	0.68
	劳动合同签订方式	2.23	1.68	2.16	1.57	2.30	1.79
	职业流动次数	1.30	1.94	2.52	2.06	0	0
观测值		3025		1563		1462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12 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 12 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 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表 4 流动动机的代际与职业差异

流动动机		收入更高	工作安全	有发展空间	离家比较近	工作轻松、自由	满足个人兴趣	能学到本领
代际	第一代	68.63	16.89	2.68	7.15	2.06	0.80	1.34
	新生代	59.15	16.29	10.70	2.85	3.06	3.06	4.27
职业	低端职业	68.53	15.56	4.66	3.73	2.62	1.63	2.74
	中端职业	54.52	16.72	13.55	4.85	3.34	3.34	3.34
	高端职业	55.15	13.60	13.24	4.78	2.21	3.68	5.51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 76.77% 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 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 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 4 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 U 型，如表 5 所示，20~23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表 5 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						次
年龄段	20 岁以下	20~23 岁	23~26 岁	26~29 岁	29~32 岁	32 岁以上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均值）	1.565	1.803	1.401	1.200	0.971	0.930

四、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与回归分析

1. 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 1980 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被普遍运用于流行病学领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介绍和实际应用还很少，而国外运用的则较早较广，艾米莉（Amelie）在 2003 年就运用计数模型分析了德国劳动力迁移的问题^[7]。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这个特征可能与实际数据不符，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实际中运用更广泛。鉴于因变量是农民工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且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将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有负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低。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该变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高。

2. 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表 6 汇报的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 Logit 模型估计。对 Logit 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的是近三年农民工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估计的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状况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他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相当显著。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数次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性格差异有关。一般来说，女性更倾向于回报率一般但稳定的工作，而男性更倾向于回报率高但有一定风险的工作。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 U 型的流动趋势，表现在 20~23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表 6 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

自变量	负二项回归模型		Logit 模型	
	系数	稳健性标准误	系数	dy/dx
男性（以女性为参照组）	0.171 ***	0.065	0.186 **	0.046
年龄段（20 岁以下）	0.235 ***	0.134	0.677 ***	0.165
年龄段（20 ~ 23 岁）	0.411 ***	0.119	0.795 ***	0.194
年龄段（23 ~ 29 岁）	0.299 ***	0.106	0.678 ***	0.167
年龄段（29 ~ 32 岁）	0.050	0.152	0.216	0.054
文化程度	-0.025	0.020	-0.029	-0.007
技术职称	-0.113 ***	0.029	-0.131 ***	-0.035
婚姻程度	-0.391 ***	0.086	-0.457 ***	-0.134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16	0.021	0.042	0.010
子女数量	-0.045	0.062	-0.014	-0.003
工作时间	-0.003	0.008	-0.008	-0.001
中端职业（以低端职业为参照组）	0.188 **	0.075	0.306 ***	0.076
高端职业（以低端职业为参照组）	0.045	0.115	-0.033	-0.008
劳动合同签订方式	-0.080 ***	0.020	-0.079 ***	-0.020
常数	0.595 ***	0.184	0.213	-

注：1.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2. 年龄段以 32 岁以上为参照组；3. 观测值为 3025。

表 6 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职称的提高。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9]。进入 21 世纪以来，工作岗位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劳动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农民工的技术职称越高，福利待遇等也就越好，就业越具有稳定性，职业流动的次數也就越少。

家庭特征方面只有部分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这充分体现了家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变换工作。

职业层次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难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农民工未能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9]，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基于职业流动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努力。表 6 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的流动次数更多，而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流动次数相对低一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一方面，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各项优势，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稳定工作，而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过低，很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这两类人的职业流动次数较少。另一方面，处在中端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多次流动以争取实现其向上流动的目的。

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与其工作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们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方式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指标。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工作强度，工作强度越大，农民工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更倾向于换工作。但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在合理承受范围之内。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合同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的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的过度流动不仅会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后果。给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有必要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基本了解和科学判断。本文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予以考察。实证分析表明，代际和职业层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频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职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和工厂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留住技术型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中端职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这可能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愿望最强有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政策。本研究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因此，政府有必要创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当前，尽管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都从部门职能角度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培训任务，但最后结果是，不仅各部门的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且培训内容雷同，而且农民工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本次调查便发现，工作单位组织的职业培训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占39.3%，其次是传统的学徒形式（25.9%）和市场化培训（21.5%），政府组织的培训只占6.6%。可见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收效甚微。因此，政府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经费的投入、培训的有效组织、指导和监督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力扶持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培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探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农村科技教育等各类教育在资金、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做到统筹安排、共享利用。而对于企业和工厂而言，也有必要创造更多能让农民工学习和积累职业技术的工作机会和岗位，以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重且家庭责任意识强，已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明显降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影响显著。因此，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密切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适婚年龄，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政府要鼓励农民工的就业单位多开展未婚职工联谊会，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同时鼓励农民工就业单位对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给予人文关怀，借此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

最后，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职业发展，目前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最为强烈。政府要尽可能多帮扶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获得更稳定、更高层次的工作创造机会和条件。譬如，广东省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制入户政策便对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具吸引力，自从实施以来业已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该政策对降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对于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值得在总结和完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有条件和能力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将农民工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等情况以分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累计，根据积分层次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直至落户成为市民，与本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期限长短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鼓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最终使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

参考文献:

- [1] World Bank.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 No. 31973, 2005.
- [2] David, B. G.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1: 438 - 446.
- [3] 符平, 唐有财, 江立华. 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6).
- [4] 符平, 唐有财.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 (12).
- [5] 李培林, 李炜.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J]. 社会学研究, 2007, (3).
- [6] 张春泥.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J]. 社会, 2011, (6).
- [7] 洪小良.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6).
- [8]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 [J]. 社会学研究, 2012, (5).
- [9] 夏显力, 张华, 郝晶辉.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6).
- [10] 何磊. 中国新生代民工透视, 专家忧集体情绪仇恨城市 [N]. 中国青年报, 2005 - 07 - 11 (5).
- [11] 黄祖辉, 刘雅萍.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10).
- [12] 白南生, 李靖.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8, (7).
- [13] 麦克纳勃·瑞安.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M] // 桑普斯福特·桑纳托斯.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185 - 218.
- [14] Diganta Mukherjee. On a Symmetric Measure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1).
- [15] Matt, L. H. and N. C. Philip.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Gap in Workplace Authority: National Versus Local Labor Markets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4, (3).
- [16] 吴愈晓.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1).
- [17] Amelie, C. and F. Z. Klaus. Circular Movements and Time away from the Host Country [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Working Papers, 2004.
- [18] 李培林, 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J]. 社会, 2012, (5).
- [19]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责任编辑 冯 乐